

洋人在中国

西方使者

主 编 白云涛

副主编 吴金华 陈家新

撰 稿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冬霞 王 冰

伍俊颖 刘建美

苏小玉 陈家新

吴金华 高 翠

郭 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洋人在中国. 西方使者/白云涛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1

ISBN 7-203-05210-9

I. 洋... II. 白... III.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世界
IV. 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1357 号

洋人在中国——西方使者

主 编: 白云涛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蒙莉莉 武静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新华印刷分公司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邮 编: 030012

印 张: 15.75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字 数: 160 千字

0351-4922208 (综合办)

印 数: 1—4000 册

E-mail: Fxxz@sxskcb.com (发行中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Web@sxskcb.com (信息室)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Renmshb@sxskcb.com (综合办)

定 价: 25.00 元

网 址: www.sxskcb.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外人”来中国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汉代。公元前53年,也就是西汉甘露元年,罗马帝国动用了7个军团约4.5万人,发动了对古称安息今称伊朗的大规模侵略战争。罗马军队侵入伊朗后,遭到伊朗军队的围歼,6000余罗马军队突围,逃至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公元前33年,西汉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率军西征,与该罗马军队发生了遭遇战,将之收降,并带回中国,安置在永昌县。后来这些罗马军人渐渐改称汉姓。虽经1000多年的同化,但现在永昌地区部分原汉代罗马军人后裔,特别是宋、张、曹、蔡、李等姓的罗马人后裔,其相貌仍然具有典型的地中海人特征。

在汉代,除了上述罗马军人来华,其他的来华“外人”都是东方的亚洲人,主要是印度的僧人或西亚的商人,还有西亚国家来汉的使者。欧美的那些蓝眼睛、红头发的“洋人”来华,目前还只能追溯到元代的马可波罗时代。

在中国古代,中国人一直狭隘地认为,中华本土以外的人都是愚昧野蛮的未开化“蛮夷”。对于“蛮夷”,古代的统治者通常妄自尊大地以鄙视和屈尊的态度对待。即使明智的君主,也通常以怜悯和仁慈的态度,或赠送玉帛,或御赐封号,来对待“万方来朝”的“化外之民”。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近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真正的大批的“洋人”来了。虽然鸦片战争失败了,清政府领略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一系列必须处理的中外事务也摆在面前,但清政府鄙视“外夷”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仍将西方来的“洋人”称为“夷人”,将所办理的对外事务称为“夷务”。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失败,对“夷人”、“夷务”这一鄙视性称呼极为不满的西方列强,乘着清朝再次战败之机,强迫清政府于1861年在北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虽然在正式的外交场合清廷官员不再对西方人以“夷人”相称,但私下里仍是旧习难改。同治六

年,也就是1867年,大学士贾桢、户部尚书宝鉴、吏部尚书文祥等上奏,仍将所汇编之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内外臣工奏折、义民信札、所有对外事务文件,共80卷16函文献,毫不客气地称之为“筹办夷务始末”。民间的“夷人”或“蛮夷”称呼,更是普遍。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交部,“蛮夷”、“夷人”和“夷务”的称呼才逐渐消失。

1840年至1919年期间,来华的“洋人”主要是外交往来时的官方公使、战争时期的军队、来东方淘金的商人、走乡村串城镇的传教士。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来华“洋人”多是以侵略者、掠夺者、剥削者的身份被中国人民所认识的。

进入民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不断向中国共产党派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代表,一些友好人士也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前来红色区域,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与此同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也有不少国家的政府代表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密切的关系,对中国革命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加,其他领域的交流,如文化和科技方面的交流,也在“洋人”来华上有较多的体现。总起来看,这个时期的来华“洋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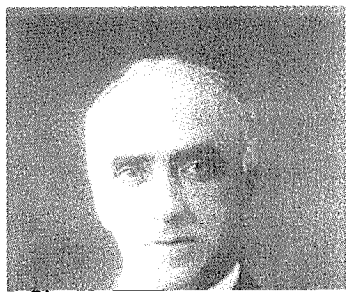
百年来,“洋人”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人民对洋人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客观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国人民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也是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历程。这里,我们选取30多位对百年来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来华洋人,对其在华事迹进行图文并茂式的叙述,力图立体地刻画人物形象。

在对人物的描述中,我们既要深刻地反映历史,又要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做到理趣兼容,赏读两宜。或许她不够完美,但我们衷心地希望读者喜欢她。

目 录

西学东传的先驱： 利玛窦	/ 1
旧上海的犹商盟主： 沙逊集团	/ 13
缘定中国： 嘉道理家族	/ 25
明智巨商： 哈同	/ 34
中西关系史上的风云人物： 赫德	/ 49
末代皇帝的洋师傅： 庄士敦	/ 62
劫掠敦煌文物的国际大盗： 斯坦因	/ 76
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 欧文·拉铁摩尔	/ 90
张学良的挚友： 端纳	/ 103
蒋介石的美国参谋长： 史迪威	/ 120
从“燕大之父”到“内战大使”： 司徒雷登	/ 140
抗日“飞虎队”队长： 陈纳德	/ 160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 赫尔利	/ 177
杜鲁门的内战调停特使： 马歇尔	/ 194
美国的汉学大家： 费正清	/ 214
毕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人： 李约瑟	/ 229

从“燕大之父”到“内战大使”： 司徒雷登





士、大学校长到驻华大使,前后在中国生活达 50 年之久。他能流利地讲杭州话、南京话和中国官话。他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他经常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他自称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我爱美国,也爱中国”,“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

“燕大之父”

1904 年,时隔 17 年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司徒雷登感到既新鲜又亲切。他先随父在杭州和四乡布道,后来只身深入农村传教。1908 年,他接受南京金陵神学院的邀请到该校任教。在南京教学的 11 年间,司徒雷登一改过去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方式,而将宗教活动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这使他成为传教士中最出色的代表人物,并且为

司徒雷登被称为“燕大之父”。图为燕京大学西校门。



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1919年,司徒雷登受教会派遣,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在原北平汇文大学和北通州协和大学这两所小神学院合并的基础上创办的教会大学。到任后,为筹集建校资金,司徒雷登先后拜访了中国许多政界和经济界人物,如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汪精卫、孔祥熙、虞洽卿等。1920年,他看中了北京西郊海淀的一片土地,就亲自跑到西安去找业主陈树藩,经过讨价还价,只花6万元就买下了243亩土地。有一次,他去找孙传芳要钱,孙传芳弄不清他的底细,只给了他100元,后来得知他的用意,便又派人送去2万元。除了向中国各方面捐募款项外,司徒雷登还几乎每年都回美国筹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去世后,有一笔遗产作教育基金,司徒雷登通过关系获得了其中相当一笔经费。此外,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兄弟等都经常给燕大“津贴”。经过司徒雷登多年不懈的努力与奔走,到1937年,燕京大学在海淀一带共购买了700多亩土地,获得各方捐款达250万美元,并在此基础上陆续建成88座大小各异的校舍。到20世纪30年代末,燕京大学已成为中国颇具规模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教务长。

作为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司徒雷登十分重视学校内部的建设和管理。他确定了燕大的办学方向:“是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宣传运动的一部分。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做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私事。”

为此,在司徒雷登的领导下,燕大相应减少了宗教课程,增加了专业课程。到1930年,宗教课程仅占1/10,专业课程则达9/10。为保证教学质量,他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外国学者到燕大任教,使燕大形成

旧中国的政治界、知识界占有重要位置,如司徒雷登曾回忆燕大新闻系说:“有一度,中国新闻机构派至世界各重要首都的代表,几乎都是我们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在中国各报馆任职的我校毕业生,也毫无愧色。”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燕京大学成为一所教学先进、学贯中西、蜚声海外的著名学府。

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这个大家庭里的家长,他以校为家,对学生和教职工有着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对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认为是一种“不愉快的现象”,持不赞同态度,但他反对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手段。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别的传教士主张对教会学校参加运动的学生进行镇压,他则表示同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在学



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同年12月,他还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和学生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对他的教学方法,有学生们评价说:“是积极的精神感召,而不是消极的速压方法,每次燕京校内的学生纠纷和风潮,只要他一出面,说几句话,一切便自然迎刃而解——因此有人说他是‘燕京的精神堡垒’,确是一点不错。”对学生和教职工的学习和生活,他关怀备至。《燕大之声》曾这样描述他:“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燕京大学为司徒雷登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当之无愧地被尊为“燕大之父”。

在办学的同时,司徒雷登也经常涉足中国政界。他与中国许多政界要人,如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张作霖、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过从甚密。1927年,经孔祥熙介绍,他与蒋介石初次见面。他说蒋介石“领袖式的人品和有吸引人的魅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逐渐对委员长和他那位能干的夫人不由得产生了崇敬的心理”。他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蒋介石对他也颇为欣赏,他成了蒋介石的义务顾问。他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彻底的蒋介石的人。”因此,每次回到美国,他都与宗教界、财界、政界广泛接触,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

在与蒋介石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司徒雷登也对共产党寄予同情。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只身赴陕北采访回来,曾在他的住所多次为燕大师生放映他所摄制的反映苏区情况的影片和幻灯片,青年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传说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使陕北红军和苏区生活成为燕大公开谈论的话题。而他本人也曾躲过日本的监视,秘密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考察,受到彭德

逐渐引起了美国上层人士的注意。1930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给他的评语是:“约翰·司徒雷登是中国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和校长。他出生在那个古老的东方帝国里,从小就受到它那富于人情世故的知识文化的熏陶。他后来来到西方民主的摇篮——弗吉尼亚继续深造。返回中国之后,他在远东的基督教教育运动中获得了广泛公认的领导地位。他通过与中国领导人长期交往,正在有效地帮助那个年轻的共和国解决其重大而复杂的问题。”1933年他回美国期间被罗斯福总统召见,罗斯福向他了解了关于燕京大学和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些情况,并向他咨询美国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侵占整个中国。

“内战大使”

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平沦陷。司徒雷登与北平日伪当局经过谈判取得“默契”,宣布燕京大学保持“中立”,保证不反日,日本占领军也不进校干涉校政,由此燕京大学暂时保持了平静。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司徒雷登独特的地位而充当了日本主和派和蒋介石秘密联系的桥梁,他多次“调解”日蒋关系,但都没有结果。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司徒雷登被日军逮捕,在日军集中营关了3年零8个月,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才被释放。一个月后,他飞抵重庆,在蒋介石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认识了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谈到延安有许多燕京大学的学生。几天后,毛泽东、周恩来还宴请了他和他的中国助手傅泾波。

抗战结束后,国共纷争日益尖锐。美国任命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国共冲突。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马歇尔的调停走到了失败的边缘。恰在此时,司徒雷登前来拜访蒋介石。在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鼓励下,司徒雷登拜见了战功赫赫而又肩负着独特赴华使命的马歇尔。在交谈中,马歇尔向他介绍了国共谈判的整个过程,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司徒雷登表示随时乐意效劳。7月10日,由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

马歇尔希望利用司徒雷登在中国的良好声誉以及与中国各方的

交往关系使国共政治谈判不致陷入死胡同，司徒雷登也自信有能力完成驻华大使的艰巨使命。他认为，国民党方面“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过去都是我的朋友，或者至少是近年来的熟人”。他对蒋介石说：“我要按我们长期的友谊而不以我新担任的美国官员的身份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至于共产党方面，他说：“他们中的几位领导人我是相当熟悉的。许多燕京学生已经‘上山’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我有教育事业方面的活动，以及我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的深切同情也是人们普遍了解的。实际上，中国人常常讲，他们是我当作自己人看待的。”对于司徒雷登的上任，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势力表

1941年春，司徒雷登在临湖轩的东厢房。



示了不同程度的欢迎。中共发言人说：“司徒博士为我共产党之友人，坚信能与吾人和善共处。但美国对华政策是华盛顿作决定的，主要并不依赖于司徒雷登博士，谁能帮助中国走向和平就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中国视为遏制苏联在东亚扩张的主要支柱，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是希望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联合政府，同时避免内战。以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为根本出发点，从骨子里头不愿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这注定了司徒雷登无法完成大使的使命。上任之初，司徒雷登就说：“我就认为我的主要精力应集中在和平谈判上”，而其中的根本的问题在于结束国共军事冲突。为此，他和马歇尔一文一武，互相配合，在停战谈判和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问题上，周旋于国共之间。

从7月到9月，马歇尔九上庐山，与在那里指挥内战的蒋介石会谈，司徒雷登有时也同行。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司徒雷登表示：希望



蒋不要过多地将他看成一个美国官员,而应将他当成旧交,一个老朋友。对中国的基本局势,他认为:“现在正在发展中的混乱状况不仅将削弱国民党,而且将为共产党提供一个破坏国民政府的绝好机会”,内战的结果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蒋介石主张用战争消灭共产党,司徒雷登主张通过国民党的改革,包括履行政协决议,来阻止共产党上台。美蒋间的分歧虽是目标一致下的方法分歧,却很难在认识上得到统一。同时,司徒雷登也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在这过程中,司徒雷登认识到国共双方的真正分歧点是:蒋介石要求共产党先放下武器,然后再进行政治改革;而共产党则要求先组成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才将军队交出。双方各持己见,司徒雷登感到调解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简单。

8月初,由马歇尔提议,组成了国共双方各二人代表外加司徒雷登的“五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政府改组问题。但司徒雷登的努力对蒋介石并没有产生多大效力,内战在继续升级。眼看调停计划成为泡影,司徒雷登和马歇尔便建议美国政

1946年,司徒雷登与马歇尔在南京。



问置全数代表如阁下及司徒大使作为居间调解者于何地？尤其使阁下指挥军事调处之三人会议主席的资格更处于难堪的地位。”

美国政府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谋求国共两党和解，另一方面又给予争执的一方以种种援助。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得司徒雷登大使兼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处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的代表。这就使得这种调停不得不在实践中处处碰壁，并最终沦为策动内战的帮凶。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和东北战场的气焰日益嚣张。10月11日，国民党不顾共产党的严重警告，占领张家口。11月15日，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宣布召开“国大”，从而完全关闭了和谈大门。1947年1月，美国在中国的调处宣告失败，马歇尔准备离开中国。

1946年，司徒雷登在南京美国大使馆官邸书房。

